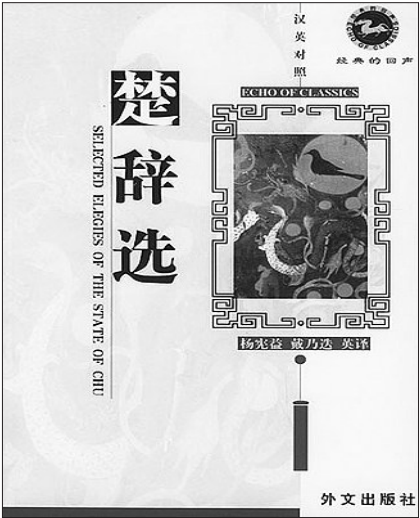


许渊冲译《楚辞》



杨宪益、戴乃迭译《楚辞选》



卓振英译《楚辞》

《楚辞》英译与中国文化“走出去”

□ 严晓江

《楚辞》直到19世纪末才有英译本，现已出版近20种，其中多数是由西方汉学家翻译的。《楚辞》英译比不上其在日本、韩国等亚洲国家的传播。著名楚辞研究专家周建忠在《当代“楚辞学”发展纲要》中将楚辞学划分为9个分支。《楚辞》英译及其研究作为海外楚辞学与楚辞传播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却一直相对滞后于楚辞学的其他分支。

《楚辞》英译融古今阐释和汉英转换为一体，包括语内翻译和语际翻译两个阶段，兼具典籍翻译与诗词翻译的双重性特征。由于《楚辞》主题深奥、语句晦涩、铺排夸张，其英译相比其他典籍的英译而言更为艰难。特别是《楚辞》经过历代学者的勘校、注疏、释义、澄讹之后，对某些字句的理解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其博大精深与精妙之美使得有些西方译者难以完全把握其真义，况且其中的部分汉学家往往以他们的价值理念为参照，造成西方读者对中国文化或多或少的误读。相比之下，中国译者在爬梳剖析以及阐释中华民族的历史典故、风土人情、伦理纲常、审美倾向等文化能力方面却更加具有优势，他们应该是《楚辞》复译的主力军。自2000年以来，国内先后出版了杨宪益与戴乃迭夫妇、卓振英、孙大雨以及许渊冲的《楚辞》英译本。这四种新译初版和旧译再版的译本在版式设计、翻译策略、译诗观念等方面各具特色。在此基础上，《楚辞》英译目前尤其需要学贯中西、译研并举的中国译者的积极介入，以使其复译事业更具主动性和针对性。

《楚辞》“走出去”的目的是向世界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以及中国文明的精神。文化是国与国加深理解和信任的纽带，翻译是沟通不同文化背景的人的心灵的桥梁。翻译家肩负文化传播的使命，恰当的翻译策略可以引导并激发目的语读者对中国

文化的精华产生浓厚兴趣。译者应遵循文化协商与合作原则，采用杂合策略，努力促成译语和源语多方面的合作，在以原文为中心和以读者为中心之间进行协调，凭借传神达意的翻译和高雅的学术品位使楚风楚语的华章远涉重洋，以扩大中国学术国际影响力，增强跨文化交际能力。

在文化内容层面上，译者要以异化策略为主，满足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的期待视野。《楚辞》英译在深层次上是价值观念的渗透，特别要注重通过主旋律的翻译让中国的核心价值观获得尊重、理解和认同。译者应彰显屈原的美政理想、忧国忧民的情怀、不屈不挠的斗志以及积极的浪漫主义精神，在文化协商和情感交流中表达《楚辞》古为今用、中学西传的心声，让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中华民族精神走近西方读者和西方主流文化，并且达到美学、哲学以及价值观等方面的互融共生。

在语言形式层面上，译者要兼顾翻译规范、阅读习惯以及审美倾向等因素，适当使用归化策略，尝试如何用目的语读者喜闻乐见的方式表达《楚辞》特有的骚体形式。例如，杨宪益曾模仿18世纪英国古典诗体“英雄双韵体”的形式翻译《离骚》，均衡的句式和考究的措词契合了《楚辞》的古雅文风。卓振英借用英诗中两行、三行、四行、五行、十行等传统诗节的韵律，达到了借形传神的效果。孙大雨在英语诗歌格律的启发下提出音组学说，该学说对其《楚辞》韵律翻译的影响很大。许渊冲在灵活变通中充分利用英语的某些特点，其意美、音美、形美的译诗使人感心、感耳、感目。这些借鉴的方法使英语世界读者有了更大的亲近感，不仅有助于《楚辞》“走出去”，而且有助于中国文化真正“走进去”，从而引起更深层次的情感交

流和心灵共鸣。

《楚辞》英译是一项涉及规划、翻译、研究、出版、销售诸方面的系统文化工程。

首先，要加强理论宏观指导，重视《楚辞》英译研究。《楚辞》英译不仅是一种语言转换，而且还要以翻译为本体从语言学、文学、美学、传播学和符号学等视角进行系统的译者研究、文本研究、文化研究、影响研究。研究者可以运用比较文学的某些思路和方法，同时借鉴接受美学理论、关联翻译理论、翻译原型理论、功能翻译理论、共有系统理论等观点以及中国传统文论的质与文、信与美、言与意、形与神等概念，充分挖掘译者的翻译思想，并且进行《楚辞》英译理论的总结，以便与文化“走出去”战略相协调。

其次，整合各种翻译范式，探求《楚辞》英译经典化的路径。如何将文学翻译发展成为翻译文学，使《楚辞》英译文也成为目的语文学的经典，是译者须要把握的深层次问题。由于诗学在文化交流中的主导作用，所以译者应抓住蕴藏在《楚辞》中的“志、情、象、境、神”等中国诗学体系的基本范畴，构建以诗学为纲的多元互补的古诗词英译理论体系，并用来指导翻译实践，力图使《楚辞》的文化诗学对目的语的诗学观念产生深刻影响。

第三，调研国外读者需求，完善《楚辞》英译体系。《楚辞》英译不能只满足于“以我为主”的单向推广，还应考虑“他者接受”的许多具体问题。中国的编译者和出版社要搞清楚不同国家的出版发行体制和操作流程，并且在编辑设计、印刷出版、发行服务等方面根据具体情况不断修订与调整，将学术传播与市场运营相结合，以先进的营销理念促进中华学术精品在海外推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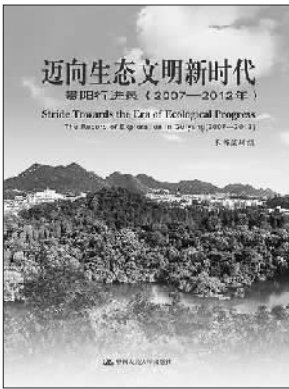
（作者系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成员、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新书快递

《迈向生态文明新时代——贵阳行进录（2007—2012年）》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要求，十八大又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07年以来贵阳市将中央精神与本地实际紧密结合，确立了建设生态文明城市的发展思路，取得了一定成效。本书是一部贵阳市5年间生态文明建设的全记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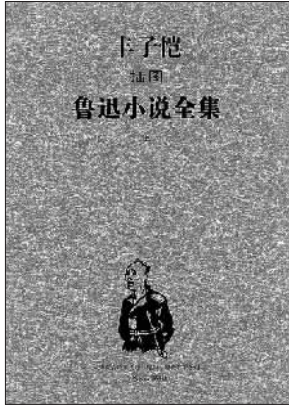
本书编辑组编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丰子恺插图鲁迅小说全集》（上、下）

国内首部既收录了鲁迅全部小说作品，又收录了丰子恺以鲁迅小说为题材的全部漫画的合集，可谓珠联璧合。丰子恺的故乡浙江桐乡县，距鲁迅的故乡绍兴很近，他笔下的鲁迅作品插图能够准确生动地描述鲁迅小说中的人物和场景；丰子恺曾为《阿Q正传》《祝福》《孔乙己》等9篇小说画了漫画插图，其中《阿Q正传》54幅，另8篇140幅，总计194幅。

鲁迅著 丰子恺插图
春风文艺出版社



《帝国的消亡》

作者曾任俄联邦政府代理总理、俄联邦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书中从介绍世界历史上各个帝国衰落的情况开始，从呈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状况入手，抽丝剥茧地分析了苏联由政策失当而引起的经济恶化如何一步步演变为危机和灾难，最终导致国家政治失控、苏联消亡的结局。

（俄）盖达尔著 王尊贤译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大仲马美食词典》

大仲马以《三个火枪手》《基督山伯爵》等作品深受中国读者喜爱，不过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他还是一个美食家。这本“美食词典”是大仲马最后一部作品。与一般词典不同，大仲马在制作词条时加入了很多文学因子，凡与美食相关的名人轶事、神话传说、笑话、史料均在收录之列，趣味盎然。

（法）大仲马著 译林出版社



《故乡有灵》

这是一本思乡怀旧的散文集，人物栩栩如生，故事意味深长，感情细腻，笔调清新。作为一个进城的农家子弟，作者走出了三个故乡：地理的故乡、岁月的故乡、心灵的故乡。他的故乡像很多村庄一样，早已面目全非。历历往事只有躬耕纸上，在字句间重见。

花如掌灯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亲亲木朵》

作者是一位室内设计师，他用绘画的方式记录了女儿木朵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木朵的可爱、木朵的调皮、木朵成长中的小萌点……完整记录了女儿的成长经历。笔触里是满满的父爱。温暖有爱的画面配上简单动人的语言，唤醒人们心中对美好童年的怀念和对温暖亲情的珍惜。

◎速写本子绘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营在微博》

书中不仅梳理了微博的发展脉络，分析了移动互联网时代社交网络的崛起以及微博的营销功能及现状，还结合大量鲜活的案例和实践经验，提出了企业微博营销的方法论、攻略定位和对企业的价值，并创新性地提出了微博营销评估的方法和体系，为从事企业微博营销和市场营销管理的相关人员提供了有益的参考。

郭舰等著 电子工业出版社



“全国古籍普查拾珍”②

经历曲折的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坛经》

2009年的一天，和同事一起对馆藏文物再次进行清点摸底的旅顺博物馆王振芬，打开了书画馆藏的册叶装普通古籍：敦煌本《坛经》奇迹般再现了。

原来，旅顺博物馆早年整理库藏时，由于装帧形制不同，将这件缝缀装的《坛经》与其他卷帙装的敦煌佛经分开，它与册叶装的普通古籍在一起，静静地度过了半个多世纪。上世纪50年代，国家文物局调拨旅顺博物馆藏敦煌遗书，它因藏处不同而留了下来。渐渐地，人们误以为它已经佚失。

《坛经》是中国佛教禅宗南宗创始人惠能的传法记录，是唯一一部由中国人撰写的被尊崇为“经”的佛教典籍，全名为《南宗最上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惠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施法坛经》。《坛经》形成于唐代中期，后世广泛流行。

敦煌遗书中共存有五个《坛经》写本，其中较早引起学者注意的是英国图书馆藏S.5475号，此件为册叶装，首尾完整；其二是国家图书馆藏BD04548号，抄写于《无量寿宗要经》背面；其三为国家图书馆藏BD08958残片；其四为敦煌市博物馆藏077号，也是一个首尾完整的抄本。而最早发现且经历最为曲折的，为旅顺博物馆藏本。

1900年敦煌遗书被发现后，逐渐引起世人关注。英国人斯坦因、法国人伯希和、日本大谷光瑞探险队、俄国奥登堡考察队等纷纷涌入，掠走大批珍贵文物文献。旅顺博物馆《坛经》，就是日本大谷探险队的掠夺品之一。

1911年10月5日，大谷探险队队员吉川小一郎到达敦煌。次年1月26日，另一队员橘瑞超也到达敦煌。他们在敦煌停留到2

月7日，两人一同离开，带走了500多号敦煌遗书。这些文献运回日本后，大谷光瑞组织人员在他的别墅二乐庄进行编号、登记、分类、拍照等整理工作。

1915年，因西本愿寺内部矛盾，大谷光瑞辞去法主职位，大谷收藏品也开始分散。1916年大谷光瑞移居旅顺，将大部分藏品带到了旅顺博物馆的前身——“关东都督府满蒙物产馆”。1951年，中国政府从苏联手中接收旅顺博物馆，博物馆组织人员清点整理馆藏大谷收藏品，发现有些敦煌遗书找不到了。缺失的敦煌遗书中，就有此件《坛经》，人们都认为该件遗书已经佚失。

离开敦煌学界视野半个多世纪的敦煌本《坛经》重现于世，迅速引起敦煌学、佛教史研究者的极大关注。2010年6月12日，此书收入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名录号06947），可以说是第三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中最有价值的古籍之一。旅顺博物馆迅速组织专家进行整理，于2011年出版了《旅顺博物馆藏敦煌本六祖坛经》一书，刊布了全部图版，并作了详细校录。

旅博本《坛经》共有52页，105折；前部抄写《坛经》，后部抄写《大辨邪正经》。从校勘价值上说，旅博本《坛经》与此前学界倚重的敦本相比，文字更优，弥补了许多缺失，是五个敦煌本《坛经》中文字脱漏讹误最少的文本。

旅博本《坛经》书末有“显德五年乙未岁”纪年题记，显德是五代时期后周世宗柴荣的年号，这一纪年清楚表明此书抄写于958年。旅博本《坛经》保留了完整的缝缀装装帧形式，经文中有多处朱笔画的间隔符号和断句标点，对于研究写本时期的中国书籍史，也有重要的标本价值。

（国家图书馆 刘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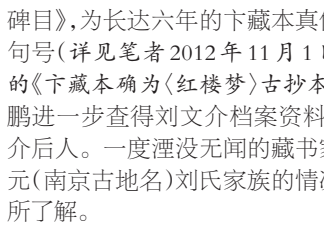


书林一叶



卞藏本《红楼梦》与藏书家刘文介

□ 于 鹏



2012年10月，上海《红楼梦》研究者王鹏发现并购得《红楼梦》卞藏本。本课题作者刘文介的手稿《孟晋斋藏碑目》，为长达六年的卞藏本真伪之争画上了句号（详见笔者2012年11月1日在本报刊登的《卞藏本确为〈红楼梦〉古抄本》）。日前，王鹏进一步查得刘文介档案资料，并访得刘文介后人。一度湮没无闻的藏书家刘文介及上元（南京古地名）刘氏家族的情况终于为世人所了解。

《孟晋斋藏碑目》的书纸上印有“上海市政府”、“上海特别市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稿”等字样。王鹏据此在上海档案馆查到刘文介亲笔填写的一份“工会会员入会登记表”官方档案。档案日期为1950年5月9日，编号为B1-2-3486-5。根据档案资料结合《孟晋斋藏碑目》等材料可知：刘文介为南京人，生于1892年9月14日，江苏省立第一工业专门学校毕业后，曾供职于南京电灯厂。1929年来上海后，先后任职于上海工部局、民国上海市政府，新中国成立后任上海市人民政府秘书处第四科科员。

2012年11月至12月，根据档案资料线索，王鹏访得刘文介孙女刘纪乐并会晤刘文介四女刘敬章和其女沈宗烈。据她们介绍，刘文

介育有四女二子。长女新中国成立前随夫去了台湾（台湾“国家图书馆”现有刘文介兄刘文严藏书《新刻徐文惠先生纂辑毛诗六帖讲意》，当为其去台时带去，刘文严的两个女儿均无后代）。二女于文革中去世，三女及四女刘敬章新中国成立前均积极投身革命活动。长子刘敬章，即刘经乐之父，生前和刘文介住在一起，1966年因病去世。次子刘珩章，新中国成立前即为解放军战士，2010年去世。刘文介一生爱书，以海书、藏书为乐（《红楼梦》卞藏本即为其1936年在上海地摊购得，该书列入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与三希堂合作项目“石头记古抄本汇编”出版计划，仿真影印本即将于今年出版），其书斋号为“孟晋斋”，《孟晋斋藏碑目》为其所有碑帖藏品一览表，生前经常翻阅。1968年元旦，刘文介于家中去世。老人一生受到周围人的敬重，人品口碑极好。

刘文介去世后，其藏书由四女刘敬章和刘珩章商量后卖出。原上海古籍书店的一位领导与刘敬章曾是同事关系，在他动员下，刘敬章和刘珩章基于革命和爱国热情，以低廉价格将大部分藏书卖给了古籍书店。卞藏本亦在刘文介去世后从刘家流出。

仅就目前所见，即可知刘文介的藏书涉猎极广：除碑帖目录《孟晋斋藏碑目》、小说《红楼梦》卞藏本外，尚有方志类的《莫愁湖志》、近代湘军史料类的《李申夫先生全集》（又名《十三峰书屋全集》）等、戏曲类的《珊瑚鞭》及各类诗词文赋古籍等等，均为不可多得的珍品。藏书家刘文介及上元刘氏家族藏书研究，特别是刘文介在金石文化领域的建树，无疑将成为尚待深入的重要学术课题。

海豚传媒引进《贝塔斯曼动物大百科》

海豚传媒旗下的湖北美术出版社日前推出了《贝塔斯曼动物大百科》。该书分为雨林动物、温带动物、草原动物、沙漠动物、极地动物和海洋动物六大系列，涵盖4000多种动物。主要读者群为12岁以上的少年儿童，图书采用“图说”形式，高清多彩的大图配文字，为小读者讲述令人惊讶且着迷的动物故事。

